

## ·民族文献研究·

##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古彝文典籍述论

刘 蔷 朱崇先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不仅收藏有三十万册汉文古籍和少量满、蒙文古籍,还珍藏着一批不为外界所知的古彝文典籍。这批彝文典籍是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由中国民族语言学的一代宗师——马学良先生亲自搜集得来的<sup>①</sup>,内容非常丰富,除彝族的民间宗教经书外,还有家谱、医书、史书、民歌、历算等,广泛涉及西南地区的社会历史生活,流传稀罕,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批经书共约 2100 余册,由国立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呈文教育部,获经费购得。北平图书馆皮藏 507 册,加上 15 块《劝善经》明代雕版和 12 册汉文档案册、写经卷子一轴<sup>②</sup>。1944 年上半年,因经费停止,马学良返回史语所,他挑取一部分彝经留在史语所。1946 年史语所从四川迁回南京,1949 年解放前夕,这部分彝文典籍被运往台湾。又据马先生回忆,这批彝文典籍的“其余复本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sup>③</sup>然而因无人能够识读,一直尘封于书库一隅,未经董理。2004 年秋天,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专项资金支持、图书馆与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文专家合作,经过费时一年的整理,完成了包括提要在内的全部详细编目,并为下一步的修复工作做好准备。现将这批彝文典籍的初步研究结果公诸学界。

## 一、文献流传 化私为公

清华大学保存的这批彝文典籍共有大小不等的 30 余包,还保持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从云南寄回北京时的邮包模样,在此次整理前从未拆封。拆包后,我们为每一册书逐项填写工作目录,包括彝文和汉文书名、作者、版本、提要、稽核、版式特征、批注、装帧、残损诸项,并编制可供检索的数据库,以此作为整

①搜书详情可参看马学良述,瞿霭堂、劲松整理:《马学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②张廷银:“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与识见并驾而行——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 年第 1 期,第 22-27 页。

③同①,第 132 页。

理完毕后送交修补的底帐基础。经过一年的初步整理,基本理清了这批六十年未动的珍贵材料的整体面貌。这批书共 252 册,除 1 册为明刻本外,其余均为明末至民国初年的写本,其中以清抄本居多。很多写本上有墨绘插图,还有 1 册为彩绘本,非常精美。每册页数多寡不一,多者如两部《彝汉教典》均是近 200 页,少者如《献茶礼仪经》、《设立氏族祠堂经》、《清静消灾经》等仅 4 页。页幅大者如《插枝图》,每页高 90 厘米,宽 67.6 厘米,按图接联展开有近 10 米长;最小者为 3 册经折装小本,高 9 厘米,宽 5 厘米,不足盈握,精巧可爱。

行文多数保持彝文的传统,为从上向下、从左向右的直书式,只有一小部分受汉文书写习惯影响,改为从上向下,从右向左直书。装帧形式多为布面裹卷装,是彝文古籍特有的一种近似线装的装帧形式,即在擦好的已折成筒子叶的书叶下,放置一块长于书叶尺寸的麻布、棉布或火草布<sup>①</sup>(有 3 册为皮质封面),将其在书脑处以线缝缀结实,眼数不一,并在布的另一端订上一根细绳,收藏时以布面将书裹起来,用细绳缠绕束成卷儿。除此之外,还有毛装、经折装等其它形式。这批书所用纸,多为彝族地区土法所造的枸皮纸,纤维粗而长,加之彝族经典多是在宗教仪式上翻用,经烟火熏炙,更显粗糙色暗。

每册书上粘有若干以彝文书写的浮签,为马学良当年指导彝族青年学生进行粗略整理时认定的书名及内容,虽不甚准确,亦有参考价值。马先生对他搜集得来的二千多册彝文典籍曾作了初步分类,分为九个类别,即:1.祭经,包括作斋经、作祭经、百解经、除祟经 4 小类;2.占卜经,包括膀卜经、鸡骨卜经、签卜经、占梦经 4 小类;3.律历;4.谱牒;5.伦理;6.古诗歌及文学;7.历史;8.神话;9.译著。此次整理按现在通行的依据学科及用途分类,分为八个类别,具体统计如下:

文学类 7 册,其中诗歌及诗赋 6 册,叙事诗 1 册;

经济类 7 册,其中帐簿 6 册,帐单 1 册;

宗教类 201 册,其中占卜 23 册,祝颂 10 册,祭祀经 29 册,作祭经 67 册,法术 5 册,作斋经 36 册,祈祷 6 册,百解经 11 册,祭神经 3 册,祭祖经 5 册,神位名录 1 册,神座谱 2 册,图集 2 册,历算 1 册;

地理类 6 册,均为不同内容的《指路经》;

医药类 3 册;

历史类 18 册,其中传记 2 册,叙事史诗 1 册,史书 10 册,家族谱 3 册,呗毫史 2 册;

哲学类 7 册,其中预测 5 册,伦理道德 1 册,训释 1 册;

教育类 3 册,语录 2 册,议论 1 册。

<sup>①</sup>彝族地区多以火草纤维纺线织布,以为主要布料。《南诏通记》:“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踏地而生,叶背有绵,取其端而抽之,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以为可以为燧取火,故曰火草。”

相比于其他单位收藏的彝文典籍,清华大学这批书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抄本年代久远,整体价值较高。这批书出自武定凤氏土司辖地,这里是罗婺文化的中心,保存下来的彝文典籍全面记录了彝族古代社会生活,深刻展现出民族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有些历史、地理、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著作已呈现出鲜明的学科特点,即使宗教经典也系统而齐全。武定彝书,多是较古的写本,是其他地区传抄之底本,其中 32 种抄本上还保留了撰写或抄写者名姓,如商武、施杨庚、鲁年阿赖、昭达、赛焦伯等,有些是著名的呗毫大师,如赛育、商杆儿、海莫卡等,他们是真正识文断字,音义全解者,这也是古彝书中不多见的现象。有些抄本上还注明抄写时间,最早者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月二十四日云南省武定县山南庄良抄本《彝汉四十九位导师教育理论》,最晚者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祈吉祝福经》。《猪膀卜卦经》一册后还保留了抄写者呗毕的抄写后记,对研究彝文写经的传播可资佐证。

其次,这批书中有些特殊内容,颇值称道,如巨幅插枝图、神座图和 7 册记帐簿、张文元呗毫家藏本等。插枝,即祭祀仪式上摆放代表神位的白柴条及青栎枝,许多小呗毫只能学着前辈的腔调诵经而不识字,不解经义,更不会插枝。有些彝文写经后会附有小幅的插枝图,但如清华大学所藏这般规模巨大者实属罕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很珍贵。如《祭场插枝图集》,每页 90×67.6 厘米,计 9 页,为目前发现的同类图集中幅面最大者,在每幅插枝图中还夹杂有文字说明,对彝族祭祖大典祭场规模及宗教意义的认识了解具有重大参考价值。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硕紫岗青年呗毫商嘎抄写的《道场神座插枝规程(示意图)》,辑录了三十多种法事祭坛神座插枝示意图,幅面宽大,绘写细致,是研究彝族原始宗教及天文学知识的重要材料。再如清同治五年(1866)施杨庚抄本《祭祖大典祭场神座插枝列位经暨祭格弩神祭坛神座列位经》,这两种经文叙述了历代神圣座次,列有诸多彝族历史人物,颇有裨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7 册记帐簿也是少见而特殊的材料。《铺腮阿萨兄弟俩分地账簿》一册,记事为清道光七年(1827),第一项记录分地情况,土地座落位置和块数,第二项记录分家前所除出的布匹的除账人和数量,第三项记录分家前支出赔付项目;《银两借贷账簿》两册,为今禄劝县撒营盘一带彝族的银钱借贷账目;《土司府内粮食支出记帐簿》一册,为某年二月至五月间土司府内用粮支出情况记录,如某月某日晚饭用粮几斗、早饭几斗、给工匠几斗等;《新年贺岁礼物记账簿》一册为武定万德土司衙署记录的收取新年礼物账簿,佃户以村为单位送去的礼物有酒、大米、绿豆、蒜、糯米、吉、芸豆、麻等;《库房粮食猪肉收支记账簿》一册,记万德土司衙署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至十月间部分粮食的猪肉入库和支出账目;《田地赋税核定账簿》一册,记载各处田地的赋税数额。这些帐簿记载了武定土司每年的经济状况,收上来的贡物等,反映了这一带彝区从奴隶制向近代社会的转化,具有很高的经济史研究价值。

在彩绘本《抽签书》上钤有汉字篆体朱文的“张文远印”，这便是马先生的经师老叟张文元家藏本。马先生曾慨叹“得一识字通经之师，比东海求仙还难”<sup>①</sup>，访到张文元后，他的彝文研究得以精进。在彝族地区那些承师久远的叟世家族保存的彝文典籍往往更为古老完整，比较后来的传抄本错误尚少。一些后学或没有家学渊源的叟在传抄经文时，或因识字水平低，或是为图方便，任意删改，致使经文错乱疏漏，字异文乱，经随地异，因此即便是同一书名的彝经，内容差异也会很大，内容虽是重复的，细处则未必尽然，同一种经少者可能只几页，多者可达数十页，比汉文古籍同书同名的情形要复杂得多，马先生所称拨交三家大学的“复本”，不能简单理解，当认真进行勘比。

第三，这批书保留了原有装订风貌，可供研究彝族文献的流传和形制，而其他单位藏本多经重修，原貌丧失殆尽。这批古彝书完整程度差别很大，有些残损严重，亟待修补。少数民族文献的形制特殊，兼之流传稀少，专业古籍修补人员多是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如何应对修补。经过调研和反复商讨，我们与天津图书馆确定了整旧如旧的修补办法，目前正在科学修复之中。

## 二、彝文“天书” 文化宝库

“古彝文”是彝族原有的一种意音文字，历史上被称为“爨文”、“𪛗书”、“罗罗文”等，为与1975年通过规范方案的新彝文（音节表音文字）相区别，通称“古彝文”或“老彝文”。在彝族神话传说中，彝文经书是由天宫派遣的代表叟带下凡间的，因此被视作“天书”。平素叟把经书藏于木箱中，置诸高阁，焚香供奉；举行法术前，必先祭经书，方有效验。那些历代传抄的旧书用到不能再用时，于祭后焚化，不敢任其污烂，以示敬重。这些普通彝族人不识的彝文经典，随着岁月流逝和社会更替，愈发少有人能识读讲解，因而被马先生称为是“日渐没落的天书”。用古彝文所书的典籍文献，广泛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科学、天文、工艺、医学等诸多方面，内容浩繁，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和宝库。

古彝书通常为手抄本，雕版印刷本较少，明刻本《劝善经》有两种不同版本，清华大学收藏其中一种，且为年代最早者，为明代末年凤氏土司所刻，其残馀木刻雕版原藏那氏土司衙署中，后捐赠国家图书馆收藏。这部书全文约22900字，用浅近流畅的彝文翻译《太上感应篇》以宣教说理，反映了汉族道教思想对彝族地区的影响，也说明了汉地与彝区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马先生因其中“网罗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新鲜材料，仁民爱物之心，尤溢于言表”<sup>②</sup>，而翻译为汉文发表。

①马学良述，瞿霭堂、劲松整理：《马学良学述》，第27页。

②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第112页，“保译《太上感应篇》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彝文典籍是彝族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古代的许多史实在彝文文献中得以真实的记录。彝族是一个崇拜祖先、讲究血统、注重世系族谱的民族,在这批古彝书中有 18 册有关历史的著述,其中有 10 种《六祖史略》,记彝族始祖笃慕及其六个儿子繁衍成六大部落的源流,起自天地混沌初开,叙述笃慕迁徙避难并与西南诸部落联姻结盟的史事等,虽是同名书,然内容差异较大,史料价值极高。《歹妥昂矣奢述略》以矣奢氏族为主线,叙述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及宗教信仰与自然观和认识论,体现了彝族古代哲学思想,涉及诸多史事和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普曲氏、德施氏、奢窣氏等的世系族谱,字里行间蕴涵着丰富的彝族古代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信息。《呗毫传承历史》较完整地记录了历史上彝族祭师及祭祀礼仪兴起和祭师传承的历史过程,对不同时代的杰出祭师予以详述。

彝族的祭祖大典既是彝族传统宗教信仰及其法事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大典之际,呗毫云集祭坛,博学多才者诵经、赋诗、致辞之声此起彼伏,同时也成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例如《开路劈荆经咒》,一册,依彝族宗教观念,在祖先灵魂升迁的道路上障碍重重,只有举行开路仪式,诵经念咒,为其扫清障碍,祖灵才能顺利升迁。本经之后附有祭祖大典之中各种仪式使用牺牲供物情况,牲畜多达上百只,对考察彝族祭祖大典规模有重要价值。

这批书中彝族宗教经典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五分之四强,其中《作祭经》和《作斋经》便有 103 册。彝族的宗教经典反映了古代礼俗、初民心态、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以及在宗教影响下形成的社会组织等,与其他历史、文学等作品同样是研究彝族文化的宝藏。在彝文宗教典籍和宗教仪轨中,作祭和作斋是两项最重要的内容,是彝族追悼死者的一种仪式,作祭导引鬼魂超越生死界限,作斋超度灵魂直达天堂。马先生曾说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解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所据,更可明礼俗之源流,提倡经俗互证的科学方法<sup>①</sup>。“证以经籍,验以民俗”,这 200 多册彝文宗教经典,无疑是我们考察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其社会形态及思想意识的宝贵资料。

呗毫的职能之一是驱祟治病,因此呗毫多通医术,明药性,有很多医药类著作传世。在这批文献中有 3 种医学类著作,两部《制药献药经》叙述了献药礼仪的由来,以及为亡灵配药和举例献药仪式的意义;《献药供牲经》上载有百余种动植物药的治病功能,涉及数十种疾病的名称,记载颇详,不啻为一本彝文的《本草纲目》,对彝族地区开发传统医药可资借鉴。

彝人死后,在起灵前由呗毫念《指路经》,为死者灵魂指点通往祖先发源地的道路,经文叙述亡灵从出生地出发,沿循祖先迁徙路线返回祖先的最早发祥地,记述沿途的风土人情,各地不同的《指路经》可以从地理上描绘出彝族

<sup>①</sup>祁庆富:“拓荒的脚步”,《读书》1987 年第 2 期,第 145-149 页。

繁衍发展的路线,汇集起来,可绘成一幅谱系分衍图或一棵巨大繁茂的谱系树。清华大学所藏的6种《指路经》,起点或在云南禄劝县北部山区的今撒营盘镇北部,或在禄劝县绞西乡境内,或在云南省武定县万德乡一带,客观记录了彝族祖先迁徙的路线和行经的地方,每一部都是研究彝族的信史。

7册文学类作品均是不同内容的雅乐诗赋,即“依依苏”,是彝族婚礼宴会上新郎新娘两家歌师对歌、赛诗的辞赋,其风格古朴文雅,内容多古礼旧制,涉及历史、伦理道德等方面。其中的一些唱段,至今仍在彝族民间广为传唱,流播四方。《依依·道薇》(闻善语花儿)雅乐诗赋一册,诗文完整,将赞颂与抒情融为一体,颇具民族文学研究意义,亟待整理。

教育类中的《彝汉教典》为彝族伦理道德、地理、历史、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多门知识的总汇,辑录了49位彝汉先师的教育言论。既是教育培养后代的教科书,也是研究彝族教育思想和彝汉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这批书中有许多亟待翻译整理者,如《实硕祭奠猿猴经》,记述祭奠亡灵的宗教意义及祭祀礼仪制度的兴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实硕氏族捉猿猴、祭奠猿猴和人类始有疾病与死亡的典故,所载颇有价值;《祈吉祝福经》中聚集了丰富的祝颂之辞,可谓嘉言美语之集成,是研究彝族语言艺术的主要文献资料;《普曲荷格传略》,记述普曲氏族的源流和荷格出嫁时的情形,以及家人对女儿的劝慰和女儿对其婚姻担忧心情的哀怨言辞,史料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再如前揭《歹妥昂矣奢述略》,颇有史料价值。等等。

民族古籍中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充实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內容。彝文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彝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真实反映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古彝书内容广博,涉及领域众多,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大多是汉文文献没有涉足的,它所记载的每一项内容相对汉文文献都是新鲜和充满生命力的。马学良先生以一己微薄之力,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将数量巨大的彝族典籍抢救出来,使之流传下去,为弘扬中华多民族文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妥善保藏的基础上,深入整理和研究清华大学这批古彝文典籍,不仅对彝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都将产生积极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刘 蔷 清华大学图书馆

朱崇先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系